



I 251
1
貴大

回忆延安整风运动

楊君辰編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回忆延安整风运动

楊君辰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57·長沙

目 录

- 一、延安！你的名字將万古流芳…………… (1)
- 二、人物生活…………… (4)
- 三、“教条主义大本营”…………… (7)
- 四、“改造我們的学习”…………… (9)
- 五、“整頓党的作风”…………… (13)
- 六、“輕騎队”、“三八节有感”及其他…………… (18)
- 七、大檢查与大論战…………… (23)
- 八、“野百合花”之类…………… (25)
- 九、王实味的面目与手法…………… (30)
- 十、“四三决定”…………… (34)
- 十一、一定要学习文件…………… (39)
- 十二、一定要反省自己…………… (44)
- 十三、延安文艺座談会…………… (46)
- 十四、整风运动的偉大意义…………… (51)

一、延安，你的名字將萬古流芳

延安是一個小地方，又是一個偉大的地方；是一個窮地方，又是一個富裕的地方；是一個落后的地方，又是一個最先進的地方。

延安人口一共不過幾萬人，其中幹部、青年學生和戰士（當地群眾叫做“公家人”的）就占了一大半。延安城里方圓不過數里，抗日戰爭初期，已經被日寇飛機炸成了一片瓦礫。但是南門外、北門外、東門外十幾里內都開辟成了機關學校的地區。北門外楊家嶺一帶是黨中央和毛主席住的地方，靠城邊是過去抗日大學學生挖的窯洞，以後是中央和軍委系統的地區，離城最遠的是陝北公學和中央醫院。中央醫院有成百的窯洞做為一行行的病房，夜里全部紙窗透出燈光，遠望象龐大的高層樓房一樣。抗日大學、陝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馬列學院，在抗戰初二三年間，給前方培養與輸送了成萬的幹部。

延安處在深厚的黃土層地帶。你若登高一望，就看見山山相連，形成一片高原。人們在山腰挖好三五成排的窯洞，住在里面冬暖夏涼。在窯頂與山坡上種着谷子（小米）和糜子（黃米），洋芋（馬鈴薯）和包谷（玉蜀黍）。收成的多少，往往要靠雨水多少和霜凍早晚，生產是一半靠人，一半靠天。山下平川一帶，有河水灌溉的地方，收成較有把握，群眾稱做“米糧川”。陝北一帶的土質和氣候都是很好的，五月間山谷里到處生長着粉紅的野薔薇。王家

坏的果树林子结下的梨，色味香气也都是很好的。可是千百年来这里的人民是劳而又苦的。这里的群众把劳动叫做“受苦”，劳动人民叫做“受苦人”。只有当毛主席的队伍来了以后，受苦人才做了主人，劳动才成了光荣的事情。在延安住过的干部和学生，谁都亲身参加过生产活动，从翻地到收割，从纺线到筑墙，从种菜到植树，各人都有自己的劳动经验，都体会到稼穡的艰难和乐趣。毛主席也订了自己的生产计划，包括蔬菜和烟叶子的生产。正由于这样热火朝天的生产运动，后来才能真正做到“丰衣足食”的地步。值得提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在延安看到的工人和农民的生活，一般是比较学生和干部们显得富裕一些的。

延安过去被认为是“文盲、迷信、不卫生”的地方。在这里高小毕业生就算是知识分子了。据说边区有的地方，过年贴的春联，往往请不到人来写字，只好用碗印一些圈子在红纸上。生育子女，总是死的多活的少。疾病很流行。因为缺少医生，有病只好请巫神。人民贫穷落后的原因到处都是一样的，首先是因为剥削太重。这里过去的地租要交出收获的一半以上，借债的利息是月利“大加一”（就是本钱的十分之一）。军阀官僚豪绅地主都是一些“土皇帝”。陕北原靠近甘肃、宁夏，（宁夏五四年并入甘肃）那里自古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旧日统治阶级造成的民族仇恨，时常爆发成一次次的民族之间的大屠杀，至今还到处留着这些历史的痕迹。例如有名的延安附近的南泥湾一带，不少的荒沟梢林，过去曾经是人烟稠密交通频繁的地区；经过一次次混战与屠杀的灾难，房舍都被烧光，人畜都被赶尽杀绝，繁华的地带一霎时又成为满目荒凉，逐渐成了梢林荒草、狼群出没的地方。这一带地方许多县名都有“安”、“定”、“綏”、“靖”的字样，例如延

安、安塞、保安、綏德、靖边、定边、安边之类，說明这一帶一向是不太平的。造成不太平的原因，除了人禍之外，还有天灾。延安城北門上題着“安瀾”兩個字，就是很好的証明。

一九三五年中央紅軍長征到了陝北，和西北紅軍会合在一起。这时延安由張学良部下的东北軍占据着。东北軍把延安附近的树木砍光了，因为恐怕紅軍借树木掩护进攻。“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軍打回老家去”，紅軍的正确口号终于把东北軍爭取过来了，使他們贊同抗日。这是党的統一战綫政策的偉大胜利。一九三六年双十二事变后，紅軍开进了延安城。从此，延安成了中国革命的一个落脚点，又成了中国革命的一个出发点。

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七年，在抗日战争前后整整十年的期間，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是全国革命者“心嚮往之”的地方，因此也引起了国内外反动派的仇恨。在抗战初期，日寇飞机轟炸了延安，随后国民党反动派用軍隊封鎖着陝甘宁边区，反动派的嘍囉們經常叫喊着要取消边区。

陝甘宁边区是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这里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化子，七沒有結党营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沒有人吃磨擦飯，十沒有人发国难財”（这是毛主席在一九四〇年二月一日的演說中說过的）。

虽然陝甘宁边区只有一百四五十万人口，可是这里却是新中国的雛型。虽然延安只有几万人，可是在这里指导着中国革命的进程。正是因此，当时无数人的心向着延安，无数的歌曲和詩篇歌頌延安。正象有一支叫做“延安頌”的歌曲里所講的那样：“啊，延安！你的名字將万古流芳，在历史上燦爛輝煌。”

二、人物生活

整个延安象一个家庭，又象一个学校。这个学校是全国性的大学校，因为除了少数的本地群众和本地干部之外，大多数是外来的“东南西北之人也”。这里有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干部，他们是群众心目中的英雄人物，因为他们都有光荣的斗争历史，丰富的斗争知识，都有艰苦朴素和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他们是全国文化界知识界特别是青年学生们从进步的书报杂志上所熟悉的经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英雄人物。这些老干部中有一小部分是知识分子出身，是在一九二五年——二七年大革命前后参加革命的，他们已经是在斗争中与工人农民结合在一起的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还有一大部分是工人农民出身的，是在一九二七——三七的十年内战、土地革命中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是革命队伍的领导和骨干成分。其次，延安常见的人物是新干部，其中有工人、农民、店员，占大多数的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这里有的是受北平一二九运动影响投身革命的，有的是受上海左翼文化界影响，走向进步的。这些人中间从学历看，有的是外国留学生，有的是大学生，有的是中学生以至小学生；从职业看，有的是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有的是电影明星，有的是职业的作家、诗人、演剧队队员。此外延安还有一些“小鬼”，是十几岁的娃娃，他们有的参加了部队，做勤务员、通信员，有的参加宣传队唱歌演戏。他们是大家所喜欢的人物，因此，推而广之，有些参加革命的中学生也被称为“小鬼”。

延安的社会关系和生活都是很简单的，大家过的是一样的靠公家供给的“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大家住的都是窑洞，穿的都是军装式的布做的干部服，吃的都是小米。听说有一个初到延安的华侨青年，看见小米以为是蛋炒饭，吃一口才知不是那样好吃。但小米却是很养人的：延安的女孩子往往满面红光，生得很结实，有的被人称为“小皮球”。延安的生活也有一些区别，但这区别是很小的。例如，每月领的津贴最少是一元五角，一般的二元五角，最多的是五元。穿的制服好坏之差不过是细布与粗布的区别。吃的虽有三种灶，大灶每星期也吃几次细粮（白面馍馍），中灶是每天一餐细粮两餐粗粮，小灶是细粮为主。

延安无人不学习。从干部到勤杂人员，有的学理论，有的学文化。马列主义，中国问题，“联共党史”，统一战线，游击战术等等，是干部学习的基本课题。有一个时期，干部都自学哲学，并且定时举行讨论会，还有一个时期，大家都业余学习俄文，定期上课交练习。

延安无人不劳动。在日常生活方面，干部和学生都自己洗衣服，延安学校不放寒暑假，每年一月、五月、九月从一日起，机关放假五天，学校放假十天，大家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拆洗被褥、缝制棉衣，不会缝洗的男同志就向女同志学习，或是与女同志“换工”。每逢年节放假时间，干部和学生要轮流“帮厨”，代替炊事员同志炒菜做饭，使他们得到休息和慰劳，这时大师傅可以有时间出席晚会，坐在好的位置上看戏看电影（看电影的机会非常少）。边区地广人稀，各机关学校都分有一些土地，大家抽出工作学习的时间参加一部分农业劳动，春天翻地，夏天锄草，秋天收割，一些哲学家、名演员，还有现在做了驻外国的大使的老干部，当

时都去上山下地。有时还要去割馬草，每人都要完成几十斤的任务。有时动员修飞机场，全延安各机关学校都出动了，一些中央委员和将军们都去挑石子，推車子。

一九三九年底至一九四一年初，蒋介石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在武装进攻的同时，还用经济封锁来围困陕甘宁边区。这期间延安的生活比较抗战初期困难多了，常常不发津贴，冬季也没有棉衣和棉被的补充，一天两顿稀饭一顿干饭，其中掺了不少的南瓜洋芋和胡萝卜。吃的菜只有鹹鹽湯煮少量的干白菜干豆角，只有很少的油花，更少見肉。我記得一九四一年八月节，附近的“老乡”（居民）給我們机关上送了一些月餅，同志們四个人分一块吃。百团大战繳获的敌人的“哈德門”牌子的香烟，运回延安时，我們机关每人发了兩盒一共二十支，在当时是很难得的东西。

抗战初期来到延安的青年男女，这时已經有不少人結了婚生了儿女。年輕的爸爸媽媽在工作与学习之余，要給孩子洗尿布，拾煤核給孩子燒飯，做一些瑣碎的家务劳动。为了改善孩子的营养，有的父母开始养鷄种菜，建立小家务。

一九四二年以后，毛主席提出了“发展经济、保证供给”的课题，后来又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全边区从农民、学生到干部，都参加了大生产运动，机关都养猪种菜，干部都种地紡綫，一兩年之內生活就大大改善了。那时候炊事員开訓練班，并且互相參觀，研究如何把飯菜做得好吃。中央党校將洗碗水里浮着的油撈出来，拿它去做了肥皂，可見菜里的油水不少。等到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大批干部离开延安，他們所种的东西都来不及收获，在地里道边或是窑洞前面，大量的无主的西紅柿和包谷都自由自在地成熟着。

三、“教条主义大本营”

如果按居民的多数来规定城市的性质，那么延安可以认为是青年们的城市，学生们的城市，外来人的城市。这个城市里本地居民不如外来的人多，外来人中青年最多，而青年到延安来学习的最多。延安有许多学校，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军事学院、中央党校、女子大学等等，但最为有名，成为最高学府的要算马列学院，不论是抗大的还是陕公的，女大的还是鲁艺的，都希望能再到马列学院学习一个时期。那时在这个学校里学习的多数是青年知识分子，但也有少数老干部，负责干部，工农出身的干部。

马列学院常请一些党中央负责同志来讲课或做报告。例如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三九年在那里做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講演；陈云同志常在那里讲党的建设的课程；王鹤寿同志讲过白区监狱内的斗争经验等。除此之外，马列学院还有一些专任教员，是有名的马列主义学者。在这批学者的教导与培养下，马列学院生长了一批所谓“小教员”都是好学深思、聪明能干的青年，他们也逐渐分担“马列主义”、“中国问题”、“党的建设”、“哲学”、“政治经济学”、“党史”等等课程。

不过，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了这么一种心理和空气，仿佛专门从马列主义书本上记些词句就可以成为理论家。青年们异常羡慕那些马列主义教员，特别是一些学者名流，懂得几种

外国語的。他們講課有时抱着一大堆厚本的原文的或翻譯的經典著作，講課中也多数是引用的經典著作中的詞句。青年們好象大都認為，学了这些經典著作，就可以指导革命，成为了不起的人物，因而听說有的“女大”學員，她們的選擇愛人的条件就是这么兩条，一条是精通馬列主义，一条是懂得几种外国語。这样一来，有些青年就只愿学习，不愿工作，从青訓班毕业入抗大，从抗大毕业入馬列学院，馬列学院普通班毕业后再进研究室。因此他們对实际工作不感觉兴趣，对革命工作的需要也不大肯考虑。有一个馬列学院的学生說过，某局(是机要部門，管收发电报的)是青年人的死亡綫。这个学生是工人出身，因为不服从分配受到了党給他的应有的处分。

有一个时期，延安有一部分知識青年，好象身在边区，心在边区外面，他們除了吃的穿的是由边区群众生产出来的而外，与边区群众没有什么联系。他們对边区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不感兴趣，認為这里一切落后，只是做为目前学习和生活的地方，他們准备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回到大城市去。有一个时期，許多人似乎認為只有書本上的知識才算是知識，知識多少的标准看你念过多少書，受过多少年的学校教育。小学毕业的是“小知識分子”，大学毕业的是“大知識分子”，沒有讀过書的工人农民就被認為是沒有知識的人。理論家就是讀馬列主义書籍最多的人，因此不必参加实际革命斗争，也能够学好馬列主义理論，成为理論家。“理論与实际联系”是馬列主义經典著作中經常講到的，这里也給了一种另外的解釋，認為一方面要学馬列主义經典著作，同时要学习当时的历史实际情况的知識，那就是理論联系实际了；还有一个办法，是多听些工作报告，看些有关实际情况

的書籍，講到理論時舉些实际的例子，也就是理論联系实际的了。正是这些想法，使得一些青年学生，成天抱着“資本論”、“反杜林論”等經典著作，讀不懂也硬讀下去，而对一些有实际經驗的工农干部却根本瞧不在眼里，也不愿放下書本到实际工作中去，对群众工作，經濟工作，技术工作，都不大感到兴趣。

因为馬列学院是这样的知識分子与理論家最多的地方，所以有一个时期它被認為是“教条主义大本营”。整风运动开始以前，这个学院就改組为中央研究院了。應該在这里說明一句：馬列学院的毕业生經過整风后，絕大多数經過了实际斗争的鍛煉，成了既有实际斗争經驗，又有較高的理論水平的党的骨干了。

四、“改造我們的学习”

一九四一年五月間，毛主席在延安干部会上做了一个講演，題目是“改造我們的学习”，开头就講道：“我主張將我們全党的学习方法与学习制度改造一下”。这次講演是整风运动的先声。参加这次干部会的除一些負責同志外，还有一部分做理論工作的同志，随后組織了“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一書的編輯委员会，在大約一年的時間里編好了这一本書，這本書是后来列为干部必讀的十二本書中間的一种。

在“改造我們的学习”里，毛主席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反对滿足于書本知識的“本本主义”，反对理論脱离实际。毛主席指出，党的历史是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結合的历史。为了更进一步，必須反对

粗枝大叶，夸夸其談，滿足于一知半解的作风，提倡研究現狀，研究历史。在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革命經驗方面，許多同志只会片面地引用馬恩列斯的詞句，不会运用他們的立場、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历史和現狀，解决中国問題。毛主席指出，許多做研究工作的对今天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許多做实际工作的，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單凭热情，把感想当做政策。这种反科学的，反馬列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純的一种表現。我們要提倡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有的放矢”、“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用馬列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从实际情况出发，研究出客观事物的內部联系，找出其固有的規律性，来指导我們的行动。

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要求全党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更加增强自己党性的鍛煉，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團結得象一个人一样。决定中指出，党所处的环境是广大农村，是長期分散的独立活动的游击战争环境，党内小資产者及知識分子的成分占着很大的比重，因此容易产生某些党员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組織的状态”、“独立主义”与“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等違反党性的傾向。中央决定采取六項办法：一是強調服从中央領導，开展反对分散主义、独立主义、个人主义的斗争；二是严格檢查決議，决定的执行；三是即时发现，即时糾正，一切批評应当正面坦白誠懇地提出；四是在全党加强紀律教育；五是要用自我批評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

“要求每个党员，特别是每个负责的领导的干部，都深刻反省自己的弱点，把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任何人都不应有自满自足、自私自利的观念，要提倡大公无私、忠实朴素、埋头苦干、眼睛向下、实事求是、力戒骄傲、力戒庸浅的作风。要改造那些把理论与实践、学习与工作完全脱节的现象，这样来更加坚定自己的阶级立场、党的立场与党性。

“最后决定从中央委员以至每个党的负责领导者，都必须参加支部组织，过一定的党的组织生活，虚心听取党员群众对于自己的批评，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

同年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指出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中央尖锐地指出“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决定最后提出要：

“向各级在职干部与训练干部的学校，进行关于了解客观情况（敌友我三方）的教育。鼓励那些了解客观情况较多较好的同志，批评那些尚空谈不实际的同志。鼓励那些既了解情况又注意政策的同志，批评那些既不了解情况又不注意政策的同志。使这种了解情况注意政策的风气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风气密切联系起来。在学习中，反对不管实际只记条文的风气。反对将学习马列主义原理原则与了解中国社会情况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互相脱节的恶劣现象。要提倡干部与学生看报，指导看报方法，指导他们分析时局的每一变动。要供给干部与学生关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各种情况的实际材料，把讲授与研究这些材料

及其結論当做正式課程，給予必要時間，并实行考績。”

在这一决定以后，延安成立了中央調查研究室，集中了一批理論工作干部，由陈伯达同志負責。那时党中央准备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各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領導同志都来到延安向中央彙报工作，中央組織了多次的干部大会，請这些同志向机关学校干部做有关根据地情况及各种政策的报告。

同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决定首先指出：“目前延安干部学校的基本缺点，在于理論与实际、所学与所用的脱节，存在着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严重毛病。”其次，規定了中央研究院，中央党校，軍事学院，延安大学，魯迅艺术学院，自然科学院这些干部学校的具体目的。最后指出“应在学校內养成学生自由思想、实事求是、埋头苦干、遵守紀律、自勵自治、团結互助的学风，而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好高鶩远、武断盲从、夸夸其談、自以为是及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惡习。关于这种学风的养成，教职員應該以身作則”。

一九四二年二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决定指出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應該是第一位的。又指出理論教育的成敗是革命成敗的第一个关键。在职干部教育包括四个范围：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与理論教育。业务教育，“做什么，学什么”，必須学会与精通业务，这是第一个教育任务与学习任务。政治教育，包括时事与政策兩項。对于一切文化程度太低或不高的干部，除业务教育与政治教育外，必須強調文化教育。高級及中級干部之具有学习理論条件（文化程度、理解力与学习兴趣等）者，于业务与政治学习之外，

均須学习理論。“在职干部教育是長期的，以发展其业务而不妨碍其业务，并不妨碍干部健康为原則，在前方，尤其不应妨碍战争。在情况許可的地方或部門，一律坚持每日兩小时学习制。在情况不許可的地方或部門，学习时间可以伸縮。一切为着在职干部教育而耗費的时间，均算入正規的工作时间之内，把教育与学习看做工作的一部分。在鉴定干部的时候，学习情况如何应作为鉴定标准之一”。

做什么，学什么，做到老，学到老，革命队伍是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又是一个学而不厌誨人不倦的大学校。这个傳統，各种风气，是在延安开始养成的。

五、“整頓党的作风”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下午，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会上，毛澤东同志做了“整頓党的作风”的演說，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頓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頓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頓文风”。

在反对主观主义的問題上，毛主席批判了当时关于“理論家”“知識分子”“理論联系实际”的几个糊涂观念。他指出，只会熟背馬克思主义經典書籍，把理論当成死的教条，完全不能应用的人，是不能算做理論家的。“如果你能应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說明一个兩個实际問題，那就要受到称贊，就算有了几分成績”。同时指出，有許多知識分子，自以为很有知識，大摆其知識架子，他們不知道这种架子是有害的，阻碍自己进步的。有些学生，从小学讀到大学，毕业了算是有知識了，但是他只有書本

上的知識，还没有参加实际活动，把知識应用到生活里去，这样算不得完全的知識分子，因为書本知識在他們还是没有証明过的，是前人总结生产斗争与阶级斗争写成的，他們必須学习应用这些知識，在实际工作中取得經驗。許多同志講“理論联系实际”，但有的同志把馬列主义当做古董鉴赏，好象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連声称贊“好箭，好箭！”却不愿意放出去。有的同志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最容易把革命弄坏。这样天天講“联系”，实际上却是隔离。另一方面，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如果誤用了他們的經驗，也是要出毛病的。所以說党内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經驗主义。而教条主义是主要的毛病。

在反对宗派主义的問題上，毛主席指出党内宗派主义的残余，对内則妨碍党的統一和团结，对外則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党内宗派主义的主要表现，首先是鬧独立性。有的同志只看見局部利益，看不見全体利益，他們总是不适当地强调自己所管的局部工作，希望使全体利益服从他們的局部利益。“鬧这类独立性的人，常常跟他們的个人第一主义分不开，他們在个人和党的关系問題上，往往是不正确的。他們在口头上虽然也說尊重党，但他們在实际上却把个人放在第一位，把党放在第二位”。在党内的相互关系上，毛主席講到了各种关系：局部和全体的关系，个人和党的关系，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关系，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关系，军队和军队，地方和地方，这一工作部門和那一工作部門之間的关系，老干部和新干部之間的关系。在处理这些关系上，都应该提高共产主义觉悟，防止宗派主义倾向。在党外关系上的宗派主义倾向是許多同志喜欢对党外人士妄自尊大，不尊重人家，不愿了解人家的长处。毛主席指示說：“对于一